

|| 随笔文丛 ||

林 鹏 著



回 想 集

林 鹏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回想集

林明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想集/林鹏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随笔文丛)

ISBN 978 - 7 - 100 - 10297 - 1

I. ①回… II. ①林…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248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随笔文丛

回 想 集

林 鹏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297 - 1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3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½

定价:27.00 元

目 录

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回忆樊金堂	001
白发青山两无言	008
回忆陈亚夫	017
英雄失路张学义	026
马义之的《文昭关》	032
艰难与独特——回忆王莹	040
康八里章	046
回忆李玉滋	063
纪念王朝瑞	067
忆袁毓明	069
荷花的品格——回忆李炳璜	072
往事：巴金、张颌是知己	076
龙居回忆	078
常平回忆	084
南管头人	088
寻访御射碑记	092
窦大夫祠观感	101
紫塞雁门	105

涿州行	109
金包公传说	112
罪孽	118
往事二则	125
童蒙忆零	129
我所经历的战争	135
战壕里的民谣	142
对周围的事物逐渐认识	144
两千年下觅狗屠,宋意归来暗呼卢	146
吊儿郎当小八路,自由散漫一书生	147
蒙斋印话	149
关于《咸阳宫》之第四十一章	177
学术者,心术也	181

不能宣传的抗日英雄

——回忆樊金堂

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后来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全家回到太原。

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有些人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

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当他知道这些情况时,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就来了。当时的省革委员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置。”有些人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是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

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记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

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要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有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那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村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背,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

别人打日本,樊金堂也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佩服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客气。樊金堂的豪爽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人,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

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了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的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个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

认真说来,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

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这种所谓的“中国通”，全世界到处都有。他们了解中国的各种东西，就是有一样，他们不了解，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只看到了码头上的中国苦力，却不了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民。他们最终都败在这些淳朴农民的手里了。所有外国的东西，概莫能外。这种农业文化的柔软的刚强，或说刚强中的柔软，说来无比神奇……西方的东方的帝国主义们，怎么能认识这种高级事物呢？

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进山后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到军区。电话上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军。延安没有日军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看到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运着十几头骡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我想这很可能是他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学习完，任命他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

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大爷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

也是这次行军，路过他家乡时，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了，全部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是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账。”碰上一个小学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的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送人好几支。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物，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

脑,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那时候人们都有点豪侠气概,都是英雄。樊金堂是这遍地英雄中的大英雄,是鸡群中的鹤。后来人们变了,变得琐碎无聊。有一次在闲谈中,樊金堂以平静的口气说:“都是小人。”我听了这话就想,君子都到哪去了?所谓农业文化的优势,就是道德。把道德丢掉了,这就像一个人掉了魂儿一样了,连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了。

事情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据说他贪污的数字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

定襄的一位老革命叫周铭,我问他:“樊金堂究竟贪污没有?”他说:“他贪污个屁。”就是周铭同志给我讲了关于庙会上给人开饭和送人手枪的事。周铭最后对我说:“他是个侠士。你听说过这种侠义之士吗?他就是有万贯家财,也敢都送了人……”

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樊金堂命大,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总算没整死。他的身体好,依然故我,威风不倒。这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他没有被整死,同老首长们的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他毕竟是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像樊金堂这么一个生活俭朴的人,他贪污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市政管理局局长。定襄县的老干部特别多,级别都很高。

例如范儒生、梁寒冰、周铭、郭兰高等等。有一回，他们一块儿回到了故乡，住在定襄县招待所里，一天，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是来看樊金堂的。在故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其他的老干部，虽然级别很高，不在话下。

他晚年，爱喝酒，爱下棋。有人告诉我，他看见樊金堂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呢。我的棋艺，应该说比较臭的。他的水平跟我不相上下，所以他喜欢找我下棋。

有一次，他老伴儿路明对我：“老樊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十五条烟，足够他三个月抽的。”谁知刚过一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吃了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十五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的？”他笑着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最近几年，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儿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说实在的吧，我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儿赶去，一同在老樊遗像前三鞠躬，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说什么“时代造就了英雄”，当然不能说这话不对，不过，大家都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怎么只出了一个樊金堂？

我认为，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几乎从来都没有真正被人珍视过。把一切光荣伟大都归于抽象的时代，这对吗？谁知道，也许是对的吧。

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过去的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白发青山两无言

人生在世,总有几个好朋友。当时同他们在一起时,也不觉什么,等他们不在了,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珍贵。这中间有一个小时候的好朋友,相处得好,说得来,比较投契,他叫张世禄。我们一起在师政治部当干事,他是保卫干事,我是宣传干事,一见面就说个没完,说呀说呀……不知哪来的那么多话。有一次他对我说:

“林鹏,我不管你,我的祖国是苏联。”

我从来没有到过苏联,苏联是什么样儿,我一概不知,我怎么能把苏联当作我的祖国呢。于是我问道:

“你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为了打日本。”

“为什么打日本?”

“为了保卫苏联。”

在当时,他有这样一种政治觉悟,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不但非常赞成,而且对他非常敬佩。在当时,我认为我也应该有这种觉悟,只是张世禄比较富于理性,我则偏于感性罢了。在张世禄的话说过以后,我才知道列宁曾经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后来斯大林又有新说法,“全世界工人的祖国是苏联”。这我才知道张世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那时候党内有一个口号，叫作“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文章就载在延安《整风文献》，又称“二十二种文件”中。我是中共党员，又做宣传工作，要说对“布尔什维克”一点不懂也不对，嘴上总是说过来说过去的，还能说一点不懂？其实真的不懂。我是在许多年以后看了《联共党史》，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意思就是多数派。比如，《国际歌》中的“英特儿纳逊纳尔”是什么意思，张世禄告我“就是共产国际”……我从前在边区革命中学学习时，问过一位老师，那老师说：“你就当世界大同来理解吧。”后来也有人告诉我：“此即共产主义社会。”

延安整风以后，部队里谈论最多的是王实味。我入伍晚些，我入伍后人们依然在谈论他。我同张世禄闲谈中，自然也谈过王实味。我问张世禄，王实味的反动思想主要是什么。我知道王实味写过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只知道一个标题，没见过文章的内容。我是许多年以后，在同张世禄分手以后好几年，在《人民日报》的《奇文共赏》中才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文本。

张世禄比我大一岁，大一岁就是兄长，并且永远是兄长。从前有新战士入伍，站成一队，先问年龄，你十几？你十几？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好，你，十八岁的，当班长。永远是这样。它绝不会让十五岁的领导十八岁的，哪怕十八岁的是个白痴。张世禄当然不是白痴，我十分佩服我的这位兄长。许多事我都是听他的。有一次我对他说起我们宣传科长，多么难做……他说：“不要有意见……不要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有意见，这可不好。”我听了他的，再也不讲那位宣传科长的坏话了。

有一次我问张世禄，“AB团”是怎么回事？他说：“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我很听话，从此有关“AB团”，无论对谁，我再

没有提起过。

后来,张世禄到连队去当指导员,我则从师政治部宣传科调到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从此,不常见面了。有时行军遇见他,匆匆忙忙,说上两三句话,急忙分手。如果想念,就写封信,道个平安。有一次他回我一封信:“听说你行军路上休息时,还拿本书看。你看那么多书干什么?你有点呆气。别惦记我,我死不了。”巴掌大的一片纸,潦潦草草的字迹,他就是这么个人。他这人短小精悍,动作敏捷,言语干脆……大小仗他都是在最前头,却从来没有负过伤。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他死不了。

1948年,对我们部队来说,是最艰苦的一年。年初是“三查”,春天是察南战役,夏天打丰宁、承德、昌黎、武清……到了秋后打了一个八达岭战役,搞得焦头烂额。退下来,往北退,退到宣化东边的雕鹗。然后四天走六百里,从雕鹗到石家庄北边的灵寿,说是保卫石家庄,实际是保卫西柏坡。四天六百里呀!大部队运动战,从北山的各个山口中,像流水一样地向南流啊!刚到灵寿,一个电报,立刻原路往回返,在新保安包围了傅作义的三十五军。12月下旬,对新保安三十五军发起总攻,全歼之。正要准备过新年,司务长们都下乡买猪去了。一个电报,连夜出发,两天两夜,四百里路,刮着大风,下着大雪,赶到大同,我们的目的地是聚乐堡,准备打大同。刚到聚乐堡又是一个电报,原路返回,打北京。

在新保安战斗打响前,在八里庄,我见到了张世禄,他已经当了副教导员,他一见我就说:“去年,1947年,一年间,朱总司令在晋察冀,我们净打胜仗,到年底解决了石家庄。今年总司令到南方去了,南方一直打胜仗,咱们呢?一会儿长城南,一会儿长

城北,从山海关到大同,围着北京转圈儿,一年走了一万多里,没打一个好仗……还不错,到年底,逮住个三十五军……”我也有同感。

然后,张世禄对我说:“破参谋烂干事,你还没干够?林鹏,快要求下连队,当指导员去,搞政工,这才是你的前途。”

“这由不了我呀!”我说着。

“你是沾了你会写文章的光,也吃了会写文章的亏。”

“大概是吧。”

“有人反映,说你很骄傲。你甭管谁说的,有没有,有,承认了就改。我们革命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令人难忘。我另一个老战友,曾经对我说,就是张世禄能批评你,别人谁能批评你……

新保安是一个很坚固的古老城堡。总攻开始,夜里,我们从八里庄出发,来到大海沱山根下,从一个两边都是小树的季节性的小河沟里,向新保安城堡的西北角接近。发起总攻,我们就是从那西北城角登上去的。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虽然是瓮中之鳖,却十分的顽强。我们胜利了,却伤亡很重。我记得在那西北城角下面,烈士遗体一个紧挨一个。其中有好几个是我认识的青年人……42年后,1991年春天的一天,我从大同去北京,正好走到新保安,车抛锚了。同行的人说:“林先生下车吧,活动活动。车的毛病不大,一修就好。”

我一下车,先看到大海沱山,心中喊道,呀,这不是大海沱山吗?再往下一看,呀!新保安……我站的地方正是那两边有小树的小河沟上端,它正对着新保安那难忘的西北城角。小树行子还在,西北城角还是老样子……我想起昔日的残酷战斗,想起牺牲

的战友们，眼泪止不住地流……汽车大概修了半个钟头，我的眼泪一直流……我自然也想到了张世禄，他一张嘴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们解放了新保安没有？42年过去了，举目四望，连一栋新房子也看不到，看那情况已经是沙漠化了。我真想大哭一场……

这情形怎么能对别人说，无此经历的人，怎么能理解我们的感情。我曾经对老战友杨善元说到我在新保安的经历，他说道：“那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亡魂，他们怎么能让你林鹏轻轻松松地过去呢，他们必定要拦住你，让你哭他们一场……”他虽然是笑着说的，却不禁落下泪来……

北京解放以后，我们就西进去打太原，太原解放后我们就去打西安，西安解放后我们就进军兰州。在进军兰州的路上，从平凉蒿店再往西走就到了六盘山下，这里有一个山口，叫三关口，传说曾经是杨六郎把守过的地方。我不知道杨六郎是不是到过这个三关口，甚至我也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有过一个叫杨六郎的人，总之，我们来到了三关口。马步芳曾经在此设防，我们在此打了一个小仗。我当时已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这时的科长是苏友林。一听说面前有战斗，苏友林就派我到前线去了解战斗情况。我听说进攻的这个营正是张世禄当副教导员的那个营，我很愿意去。我参加了那次战斗，马步芳的骑兵战斗力不行，打得很激烈，但是战斗结束得很快。我们有六名战士阵亡，负伤的有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张世禄。正因如此，我们没有见着面。他后来写信告诉我：“我肩部中了一枪，只能算个轻伤，当时我倒在地上，救护队的人硬把我按到担架里，抬到绑扎所。我大发雷霆，轻伤怎么能下火线，我又跑回去，同部队一起越过六盘山……”我是到了兰州城东的马家山下，才接到这封信。当时三关口战斗